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七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四三期 ——
（二〇〇五年七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7b）

【往事回首】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郑维山将军	董保存 范占英
【历史一页】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	陈先瑞
【知情者说】《解放军报》与“活学活用”运动	卢弘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回首】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郑维山将军

• 董保存 • 范占英 •

在1970年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许多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家深陷政治漩涡，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便是其中之一。当时的郑维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基于敬仰和崇拜毛泽东而作的会议发言，竟然会成为被批判的靶子，他本人也因此被毛泽东批评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若干年后，郑维山回忆起这次会议，仍颇为感慨地说：“在政治斗争上，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人有时还是很幼稚的……”

◇ 初上庐山

接到九届二中全会会议通知时，郑维山正忙着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部队检查工作。那时北部边疆的局势很紧张，战备工作任务很重，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比较混乱，中央决定实行军管，作为军管的负责人，郑维山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接到通知，他想，如果这次庐山开会能够使大的形势安定下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也就容易理顺了。

郑维山和其他代表一样，提前就得知了会议主题——修改1954年宪法，研究我国经济发展计划。这些内容的确重大，但与军事工作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郑

维山认为，只要把握好毛主席定的“新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的原则，顺利开好这次庐山会议不成问题——而只要会议正常开展，对郑维山来讲就算是放松和休息了。

8月20日，郑维山和华北地区的代表乘坐一架大飞机，先飞到安徽省的安庆市，然后换乘小飞机，飞越过长江。傍晚时分，降落在江西省九江机场。接着，他们坐上了驶向庐山的汽车。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来到庐山脚下，人们方能体会到毛泽东诗词的无限韵味。在驶入半山腰的汽车上，代表们纷纷感叹着庐山的秀美。

这是郑维山第二次上庐山了。1959年，他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庐山会议。那次会议，本来是要反“左”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批判彭德怀。从此，他眼中的这座山，就再也不仅仅是一座旅游名山了。

住下之后，会务组通知本次会议共有三项议程：第一项，由康生对新宪法做简要说明；第二项，由周恩来介绍我国经济发展计划；第三项，由林彪讲战备问题。对于会议的主要议题，中央办公厅已打过两次招呼了，是毛泽东交待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传达的，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新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也不当国家主席。

在一般人看来，毛泽东毕竟是一个77岁的老人了，不当国家主席，减少繁重的国事活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宪法中设不设国家主席，一般人的看法和毛泽东的想法就有很大距离了。从现在披露的材料看，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还是有深远考虑的。这和“接班人”问题有着直接关系。

毛泽东知道，国家主席就是名正言顺的“接班人”，而此时他对“接班人”的人选仍心存犹豫，也就不能轻易在宪法中设这个位置了。自从1956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后，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改变了颜色，搞修正主义，并认为这与斯大林没有选好“接班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共党内，1959年出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也被他认为在搞“修正主义”。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已感到“接班人”问题的紧迫。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党章中确定了林彪为“接班人”，但毛泽东对此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放心。他还要再看一看，能不能把这个用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交给这个“接班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些处于政治中心的人们是不可能看清和理解的，郑维山也不例外。

到庐山的前几天，山上的气氛是祥和的。会议议程明了，不涉及敏感问题。郑维山和代表们都认为，这将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完大会，回去就是国庆节了，国庆节之后就可以接着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

心理上的放松让代表们更容易被庐山迷人的美景所感染。在开会前的两天，他们爬五老峰，游仙人洞，在山上留影，互相开玩笑。就连一向十分严肃的李雪峰，也连连与同伴们合影留念。

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一场由“副统帅”酝酿已久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暗中进行。

◇ 林彪搞“突然袭击”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隆重开幕。

郑维山随着李雪峰和陈先瑞等人神情庄重地走进庐山人民剧院。此时，主席台上的位子还空着。

休息室里，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正在开碰头会。毛泽东环顾常委们一圈后，慢条斯理地问：“你们谁先讲啊？”

短暂的沉默后，林彪侧过身来，不动声色地说：“我讲一点意见。”

按照常规，常委们要事先向组织通报讲话的主题，但对于林彪的讲话内容，在座的常委们事先都不知道。预先安排在开幕当天讲话的周恩来和康生都谦让说：那好，请林副主席先讲。

毛泽东看了看林彪，又看了看周恩来和康生，说：“你们三个讲吧。”

林彪要讲什么，他早有准备。对于这次中央全会，他看得非常重。特别是修改宪法，设不设国家主席，对他来说关系重大。他知道，毛泽东一直强调自己不当国家主席，而只要宪法中设国家主席，这个位置的当然人选自然就是他这个写入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经过左右权衡，他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在会上讲话。在他看来，还是要把毛泽东往前台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会议开幕的铃声响了，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一起走进会场。代表们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见到自己崇拜和热爱的领袖，代表们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周恩来简单地宣布了会议议程之后，林彪第一个开始讲话。他首先强调毛泽东对修宪工作的重视和领导，给人以主席完全掌握着修宪的主动权之感。他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林彪接着为毛泽东戴高帽：“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接着，林彪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彪在此虚设了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使代表们误以为党内真的出现了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声音。他接着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讲话虽然有比较浓重的湖北腔，但是郑维山和所有代表都听得全神贯注。听着听着，郑维山不禁瞪大了眼睛。他不知道林彪的讲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他感到林彪的话是有所指的。

而此时，人们很难注意到，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已经显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林彪的讲话滔滔不绝，占用了一个半小时。等他讲完，已经是下午4点半了。毛泽东面无表情地对周恩来和康生说：“你们讲吧。”

周恩来说：“计划问题有了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接下来，康生发言。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顿了顿又说：“……在群众讨论中，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

此时，康生借群众之口明确提出了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这个正中林彪下怀的建议。

毛泽东显出明显的不悦。他近乎烦躁地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走出会场，郑维山和许多与会者一样，已经感到会议出现了新情况。但究竟是什么情况，他们一头雾水。

郑维山不可能看出，一向“紧跟”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的林副主席，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妄图攫取更多权利，实施提前“接班”的阴谋。林彪的这个讲话有着多重的效果——这个讲话，他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向所有中央委员讲的，只要毛泽东不反对，就等于首肯了他的这个讲话。他强调毛泽东的国家元首地位，也就是国家主席的地位，毛泽东如果不当，代表们一定要他来当，毛泽东也应该让他来当……

事后，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这个讲话，是他向毛泽东发难的一个信号。林彪之所以敢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毛泽东“叫板”，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此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实力”：一方面，林彪集团的势力已经壮大到一定程度。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居于“副统帅”的地位，他利用这一地位结党营私，使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了顶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还有一些骨干和党羽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黄永胜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林彪的妻子叶群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并实际上控制了军委办事组。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军权。

另一方面，林彪还在着手策划军事武装政变。早在1969年10月，林彪就指使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其刚刚当兵不久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私自授予林立果指挥、调动空军的权力，以便让他亲自掌握这个“机动能力强”的军种。

透过窗户，郑维山看到，不知什么时候，黑云遮住了庐山的天空。雾霭笼罩着庐山的山峰，一场只有在南方才会出现的连绵不断的淫雨即将来临。

◇ 陈伯达来到华北组

23日晚，郑维山参加了由周恩来召集的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会上，吴法宪提议说：“林副主席的讲话为我们的思想发展明确了方向。这个讲话没有文字稿，我们能不能再听一听讲话录音？”

事隔许久之后，人们才明白吴法宪的这个提议也是林彪预谋的一部分。然而在当时，多数人都难免被吴法宪的假象所蒙蔽，他们随声附和要求听录音，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意了。

24日上午8时，除毛泽东、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人员在庐山人民剧院继续开会，听林彪讲话录音。会议由汪东兴主持。录音播了两遍，直到11点半才结束。代表们纷纷散去。

在礼堂门口，陈伯达塞给汪东兴一份材料，说：“这份材料请你打印5份。”汪东兴见是一些伟人语录，就问：“是要发给常委吗？”陈伯达含糊地回答：“是。”

午饭后，代表们陆续回到别墅里休息。郑维山和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住同一别墅。

走进房间，郑维山的秘书杜辛给他们倒了两杯水。郑维山端起杯子说：“不是传达过不设国家主席吗？怎么又要设了？这是怎么回事？要我看，当国家主席，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行！”

“设不设国家主席，要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北京军区不表态怕不行啊！咱们该怎么办？”陈先瑞谨慎地说。

郑维山是出了名的炮筒子脾气，他说：“事先通知说不设国家主席，听讲话又说要设主席，看不清了！”

一旁的秘书插话说：“那就等看清楚点再表态，急着发言怕不好。”

陈先瑞气愤地说：“林副主席的意思很明白，肯定是出了一股反毛主席的逆流！”

郑维山接过话头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紧跟毛主席就对了。”

24日下午，按会议议程安排，九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新宪法草案和林彪在开幕当天的讲话。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华北地区、军队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军委和军兵种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计30多人。会议由华北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李雪峰主持。

讨论会开始不久，陈伯达和汪东兴来到了华北组。当时，一位老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会议的李雪峰说：“欢迎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到华北组参加讨论，我们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讲吧。”

陈伯达是闽南人，他的闽南方言大部分代表听不懂。会场上，李雪峰和能听懂闽南话的代表轮流给陈伯达当翻译。由于讲话难懂，5个秘书轮流做记录，个别代表小声互相做着解释。

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

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部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陈伯达一边说，一边抖动着一份打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

陈伯达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说到此处，他手舞足蹈，生动地形容“有些人”跳起来的样子。

陈伯达富有煽动性的讲话，实质上将会议争论的矛头引向修改宪法工作小组的张春桥。郑维山不知道，陈伯达与张春桥等所谓理论家之间的争斗，从党的九大闭幕以后就开始了。

1个多月前，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在7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伯达同张春桥对社论稿的提法发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4个字去掉，而张春桥坚持要保留这4个字。争来争去，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请示主席。

这次争论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明争暗斗的时刻，喜投机而又由于受到江青等压制而怀恨在心的陈伯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早就公开倒向林彪一边。他与林彪集团过从甚密，在8月14日修改宪法草案的会议之前，他还接到林彪夫人叶群打来的电话，要他准备有关“称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会议上同张春桥斗争，同时还要准备在庐山进行大的斗争。正因此，才有了上面陈伯达叫汪东兴打印伟人称天才语录的一幕。

郑维山一边费力地倾听陈伯达的讲话，一边做着记录。陈伯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又直接分管华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人们对他的讲话不能不重视。很长时间以来，中央文革小组在直接行使着中央政治局的权力。事实上，就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不久，陈伯达还几次在华北地区检查工作，其中两次还指名要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

在当时极“左”思潮猖獗和个人崇拜浓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缺乏应有的辨别能力，甚至许多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也不例外。陈伯达慷慨激昂的发言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激动起来。有几位老同志发言表态，建议在新宪法中设国家主席，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接着是汪东兴发言。汪东兴讲话口齿清楚，声音洪亮，逻辑严密，代表们听得十分真切。与陈伯达令人费解的发言相比，汪东兴的发言让代表们精神一振。汪东兴的讲话主旨非常明确，他说：“首先，我完全赞成林副主席的讲话，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跟他斗争到底；第二，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八三四一部队和中央办公厅都接受不了。我代表八三四一部队强烈要求新宪法恢复设国家主席。我代表八三四一部队强烈要求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副主席；第三，我要澄清两个事实，有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我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毛主席是从来不让步的。”八三四一部队是保护主席的部队，可以直接由汪东兴调遣。在郑维山和代表们听来，汪东兴的弦外之音是说，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重大原则问题，他肯定也不会让步。汪东兴接着说：“有人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减少国务活动，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毛主席非常乐意会见国家的重要外宾。近几年来重要外宾到我国访问，强烈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非常乐意见他们。我完全清楚。哪次活动少得了毛主席？”

汪东兴的讲话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它在代表们中间产生的震动是巨大的。代表们开始相信确实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在当时，是否捍卫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对人们的一种考验。代表们情绪激动，纷纷要求发言。此后，华北组讨论的主题就转到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上来。代表们此时似乎已经将毛泽东事前多次交待的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指示抛到了九霄云外。陈毅元帅表态说：“如果毛主席同意当国家主席，我赞成主席当国家主席。大家都说毛主席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是群众中锻炼出来的天才……现在还有人出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我们要坚决同那些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人作斗争，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在华北组，有人曾经猜疑林彪、陈伯达等人所指的“坏人”是陈毅等曾被污蔑为“二月逆流”的老帅。与很多人一样，郑维山也曾有过这样的疑惑。因此，在陈毅发言后，立即有人批评陈毅故作姿态。

郑维山对陈毅说：“老总啊，少说两句吧。”汪东兴指着陈毅说：“这次没你的事！”

会间休息，汪东兴在和李雪峰、解学恭、吴德小声说话。几位仍然信守着会前通知而对陈伯达等人持怀疑态度的老将军凑过去向汪东兴打听消息。他们认为，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每天呆在主席身边，最了解毛主席的真实想法。郑维山也有着同样的看法。

萧劲光问汪东兴：“汪主任，会前不是传达过不设国家主席吗？现在又主张设，是不是风向真的变了？”

汪东兴说：“萧老，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可不能糊涂啊！”

郑维山走近汪东兴，问：“汪主任，事情有变啦？”

汪东兴指着郑维山，严肃地说：“你这个郑维山，再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同志，你要知道，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

李雪峰追问：“那主席知道这件事？”

汪东兴：“知道，就是不让点名。”

听了汪东兴的话，代表们更加确信，反毛主席的野心家出在中央。中央要在这次全会上改变议题，进行捍卫主席的领袖地位、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代表们知道，他们在大事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

于是，大家纷纷表态。紧张、浓烈的气氛笼罩着华北组会议。几乎所有代表都要求发言，争着表态，调子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动。

在这样一个“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性大会上，军队一定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这是郑维山的初衷。以郑维山的直爽个性，一旦确信有人在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搞鬼，不想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时，他就要坚定地站出来发言。郑维山的发言虽然简短，也并不慷慨激昂，但是非常有力。他说：“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部队坚决维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决不允许有任何人贬低他。”

吃晚饭时，华北组的几个代表围桌而坐，大家情绪亢奋，还在议论着会议的内容。一个以处事深思熟虑著称的代表问李雪峰：“晚上开会的时候，你能不能让汪东兴早点来，我们再问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另一个代表插话：“听说，其他组讨论会普遍将矛头指向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华东组，上海的徐景贤、王洪文紧张得不得了。”

正说话间，王洪文和徐景贤各自端着一杯酒，笑容可掬地走过来向李雪峰敬酒。

王洪文说：“雪峰同志，我们来向您取经来了。你们组有什么新消息呀？”

当时，作为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的成员，王洪文和张春桥一样，也被代表们归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一派，从而一致对他们进行批评。李雪峰显然也很反感这两个家伙。他面无表情地说：“中央会议，独立思考嘛！”

两个人没趣地走了。

24日晚上讨论之前，汪东兴果然提前出现在会场。由于向秘书交待北京军区战备情况，郑维山来晚了。他到场时离会议开始只有几分钟。郑维山被认为是一个粗中有细的将军。此时，他的细致又表现出来了。他对自己下午的发言表态仍然有些不安，再次问汪东兴：“你说有人反对主席当主席，这样讲，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的回答与先前一样：“知道，就是不让点名。你知不知道，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郑维山进一步确信了坚持要“主席当国家主席”意见的正确。

当晚的讨论，代表们情绪更加激动，简直到了“闹”的程度。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发言，目标直指修改宪法工作小组的康生，说他们要改变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几个工农代表相继起来挥动着拳头表示：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斗争到底！

和郑维山一样，多数代表已经转变思想，强烈要求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少数仍在坚持按主席先前指示不设国家主席的代表遭到代表们的声讨。

晚上，郑维山再次发言。他的讲话很简单，大意是同意设国家主席，要求主席当国家主席。他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今天，还有人反对毛主席，这是要进行彻底批判的！”陈先瑞政委说：“那就要千刀万剐！”

像郑维山这一层的领导同志，特别是行伍出身的领导同志对理论问题知之不多，但他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深厚的，对毛泽东的崇拜有时是盲目的。正因为如此，郑维山和其他代表才有了如上的发言。殊不知，当他们认为自己是捍卫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时候，却在客观上帮了林彪的忙。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更是郑维山等人的悲剧所在。

不仅郑维山如此，就连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也犯了错误。对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的发言，汪东兴事后是这样检讨的：“我在会上也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强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心愿，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向党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没有认真考虑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 “六号简报”提前出笼之谜

说到九届二中全会，就不能不提所谓的“六号简报”。正是这份被毛泽东称为“反革命简报”的文件，使李雪峰、郑维山等人蒙受了不白之冤。而排在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的华北组“六号

简报”，在四号、五号简报没有出炉之前抢先刊发，这既不是华北组组长李雪峰授意，华北组副组长郑维山更是无从知晓。到底是谁安排了“六号简报”提前出炉的呢？这一点至今仍不清楚。

24日当晚，华北组会议结束后，会务组将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稿做了整理，将稿子送给两人审阅修改。深夜12点，简报组的同志找陈伯达要修改后的稿子，陈伯达借口说还没有改好，让先出简报。汪东兴的讲话稿也没有交还会务组。这样，会务组只综合了华北组代表的发言内容，出了一份简报，其中包括郑维山的发言。这份由李雪峰、吴德、解学恭三人签发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就是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六号简报”。

简报上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对此，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简报还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中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事实上，其他组发言的火药味比华北组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华北组讨论的同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段，引用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同样的七段语录，按照统一口径，大肆煽动。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国家不能没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可是有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的发言更明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当晚，各组都整理了简报。为什么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先出来了呢？据李雪峰回忆，他和解学恭、吴德签字后，简报深夜1点被送到简报组。不知什么缘故，也不知什么人安排压下了已编号的四号、五号简报，提前排印了六号简报，致使这份简报25日一早就发到了一些人的手上。后来也有人猜测，“六号简报”首先出笼是陈伯达授意的，也有人说是搞简报的某些人安排的。总之，随着华北组简报的率先出笼，一大批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的老同志被深深卷进了政治的漩涡。

郑维山是在25日清晨看到这份简报的。他浏览了一下，只见报头赫然印着“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内容正是华北组的二号简报。

郑维山立即喊来秘书杜辛，问：“简报这么快就出来了？四号、五号简报怎么没见着，我们组的六号简报倒先出了？”

杜辛当然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只是向郑维山报告，简报是由李雪峰组长、解学恭和吴德副组长深夜签发的，负责出简报的是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至于他们为什么把华北组简报提前出来，他根本不知情。

见郑维山不说话，秘书又补充说：“郑司令，我们华北组简报如实反映了华北组的讨论情况，至于中央办公厅排在哪天发，那是他们定的。”

“六号简报”出得如此蹊跷，这种现象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后面到底掩盖着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郑维山不得而知。

◇ 毛泽东震怒

25日中午，毛泽东手里拿着一份华北组“六号简报”，脸色阴沉地问汪东兴：“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汪东兴低着头不说话。

毛泽东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汪东兴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泽东冷冷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汪东兴还想解释：“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更加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

下午3时，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说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这样继续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收回“六号简报”，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责令陈伯达作出检查。

从8月25日到30日，毛泽东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会停开。此时，郑维山和许多同志一样，还不能确切判断问题的严重性。但当他们看到毛泽东于8月31日写在陈伯达《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的《我的一点意见》时，才切实感到主席的震怒是多么强烈。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是毛泽东和林彪曲曲折折一生当中的一次暗中较量，更是围绕党中央最高权力的斗争。可是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泽东虽然对陈伯达义愤填膺，却并没有公开自己与林彪的矛盾。后人认为，这一方面是出于维护团结的需要，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自己所，

当时“看不清了”。

9月1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明确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都要作检查。还要求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开会，听他们作检查。

事后，毛泽东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

“还有李雪峰、郑维山。”毛泽东的这句话，虽然后来经过历史的检验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对李雪峰和郑维山的政治生涯却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此后的几天，蒙受不白之冤的郑维山一直心情沉重地在别墅附近的山路上徘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更不知道此时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是怎样一种微妙的关系。他对陪在身边的杜辛说：“我的发言，还不是反复问了他们才说的？我以为是主席的意思呢……”他默默地表白：“华北组没有人想搞阴谋，我们是不知底嘛。除了陈伯达和汪东兴，我们怎么能确切知道主席的本意呢？”

凌晨两点钟，郑维山吃过一把安眠药后，在床上辗转反侧了许久仍然难以入睡。他“噌”地坐起来，披上外套，推醒秘书杜辛，急切地说：“我说，你整理，我要给主席写封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给您写信。在华北组的会议上，我先后有两次发言。由于路线觉悟不高，我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犯了严重错误。现将有关情况和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向您汇报……

9月1日，会务组收回了代表们的所有文件和会议笔记。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

这天，心情沉重的郑维山认真聆听了毛泽东的闭幕讲话：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还没有看过。……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随着讲话的进行，毛泽东的情绪开始激动：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

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了，你有啥办法呀……

离开庐山的时候，毛泽东的声音还在郑维山的耳边回荡。他希望毛主席能够看到他的那封信，能够听他把有关事情的原委讲清楚，能够消除他老人家的误会和误解……

□ 《党史博览》2004年11期

~~~~~

## 【历史一页】

### 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

• 陈先瑞 •

#### ◇ 改组领导班子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38军党委12月10日送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队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12月1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我和军区的郑维山、李雪峰、吴德、吴忠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都拥护毛泽东的批示，决定先开军区党委常委会，然后开党委扩大会贯彻。19日、20日，军区党委常委会连续开了两天会。与此同时，中央也决定召开华北会议。

19日，毛泽东在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中央决定，北京军区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也参加这次华北会议。

我们接到中央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通知后，立即通知全军区师以上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到京西宾馆报到，河北省革委会及省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到会了。1971年1月9日后，当时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人也被并入华北会议。这次军委座谈会，在并入华北会议前，已经开了有一个月，因此，被毛泽东批评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两个会合到一起后，北京军区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是叫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

会议分为小会（北京军区、天津、河北省负责人）、中会（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全体人员）三种形式进行。会议由李德生、纪登奎主持，黄永胜、李作鹏到会不讲话。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黄永胜、李作鹏到会不讲话的缘由。会议按照毛泽东对38军报告的批示，围绕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阴谋活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等问题，深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严厉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时对刘子厚和我的所谓“严重错误”也进行了批判。

江青以庐山会议上“反林有功”的姿态，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并作了多次讲话。她又把所谓“二月逆流”，“杨、余、傅事件”，杨勇传达批萧华的问题等提出来，把会锋转向了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她编造说“从聂荣臻开始，华北的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紧接着一个班底”，“你们就是相信聂荣臻、徐向前。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她还造谣污蔑、怒斥北京军区的领导干部，说“郑维山在解决晋东南武斗问题时向我要开枪权、扫荡权”，“陈先瑞让文工团一个吹小号的人坐他的车，用他的红机子（当时我并没有这种电话机）跟踪我”。她还让军区一名副政委和一名军长站起来，罚站训斥。

对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我很不理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江青为什么对北京军区的仇那么大，对军区的一些人和事记得那么多。她在一次会上点了军区十几个人的名，而且在每个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破口大骂。说军区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为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翻案，同她作对；又说军区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文艺口“支左”时反对她，等等。她声嘶力竭，胡言乱语，主持会议的李德生、纪登奎也无可奈何。会议期间，江青还让与会人员看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有关日本军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几部电影，尔后胡说：“北京军区也是企图挟天子令诸侯，搞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当时的江青位高权重，许多人半信半疑地认为她讲的话不是个人意见。会议被江青搞得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有两位军职干部和两位师职干部，被搞得心脏房颤，有的送进了医院。

1971年1月24日，华北会议召开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即北京军区与军委座谈会的人都参加的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结论性的讲话。26日，李雪峰、郑维山在全体大会上作了检讨。华北会议只开过这两次大会。大会后，改组了北京军区。改组北京军区的命令没有在大会上宣布，而是采用个别谈话的方式宣布的。命令免去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别任第一和第二政治委员。27日是春节，历时一个月零10天的华北会议结束了。

春节过后，北京军区以各省军区、各军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军区党委召开机关全体干部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传达贯彻华北会议精神，深入“批陈整风”。这次会议又开了一个多月。会议过程中，不断传来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这使北京军区的会议不断升温。会议进一步深入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路线错误”。郑维山靠边站了。我作为郑维山的同伙，受到了面对面的批判。同时还株连了军区几位领导和机关的一些部长、副部长。会议抓住这些人不放，批判的调子很高，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对先后历时两个多月的华北会议和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我认为，有正确的一面，就是深入批判陈伯达，也有错误的一面，就是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纠纷，冤枉了一批同志，损害了团结。

我多年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38军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影响很小，毛泽东对他的活动的估计却如此之高，对北京军区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我觉得，这是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起了作用。

当时的情况是：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北京军区参加会议的除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几位外，我和郑维山、尤太忠、郑三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全会上发表了讲话。24日，各组展开讨论。

北京军区与会人员编在华北组。全组正在讨论林彪的讲话时，陈伯达来了，并在会上发言。陈伯达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陈伯达是福建人，他的南方口音极重，听起来很费劲儿，但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我基本听清楚了。

同陈伯达一起来华北组的还有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同志。陈伯达讲完后，汪东兴接着也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

当天晚上，李雪峰、吴德、解学恭三人签发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简报上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对此，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简报上还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小组会上，没有人说、简报上也没有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这次小组会议以后，再没有开小组会。由大会秘书处通知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会议由此停顿。与会人员当时对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并不知情，但都觉得事情没有完。

九届二中全会于9月6日闭幕。对会议的传达贯彻问题，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说：“在中央没有下达正式文件前，会议情况不准透露出去，回去只讲会议公报，会议精神先向主要领导同志吹吹风。”据此，北京军区与华北各省、市到会的领导同志作了协商，决定军区各军、各省军区领导干部分别参加所在省、市的传达，尔后，各军级单位自己组织部队学习会议公报。九届二中全会的公报，一反寻常地于9月10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报》对全会上的斗争只字未提，照例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全会号召“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军区党委和部队把传达学习的情况及时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写了报告。

这次全会后，毛泽东是从庐山乘火车回北京的。9月16日，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当天中午我接到李雪峰的电话，让我和郑维山下午五点到达丰台火车站专线停车处，毛泽东要接见我们。郑维山当时在军区内蒙古前指，赶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前去，我是和吴德一起到达丰台车站的。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军区分片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部队学习会议公报的情况。毛主席肯定了北京军区分片传达的做法。接着询问部队情况，我把部队的思想、战备、训练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事后，我通知郑维山回来，召开军区党委全会，传达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并向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写了报告。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针对庐山会议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爆发的斗争很注意，并不想仅限

于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而是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林彪反党集团在军队的势力。这些办法，就是他自己说的“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他对38军报告的批示是“抛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掺沙子”、“挖墙脚”。

华北会议批判陈伯达的大方向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对会议涉及的诸多事情，无需评论是非曲直。但是，有几个问题是应予澄清的。一是会议对人事的处理是错误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反映大家意见，建议宪法设国家主席之职，历史已经证明是对的，不是什么“反革命之罪”。二是“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的问题。当时除了中央能够阻止陈伯达之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各地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北京军区没有请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三是“太上皇”一说。这也不是事实，从根本上说中央文革当时是全国各地的“太上皇”。四是林彪对毛泽东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这纯系捏造。北京军区没有与陈伯达狼狈为奸，不存在“没有很好打通思想”的问题。38军的报告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是正确的。但是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北京军区这不是事实。说“陈伯达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保定问题”极其复杂。38军与河北省军区各支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38军支持的一派坚决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当时却为中央所信任的。所以“保定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陈伯达。

#### ◇ “九一三”事件之后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九一三”事件受到空前未有的震惊至今还记忆犹新。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30分，我被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李德生打来的。李德生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周恩来总理在那儿召开紧急会议。从李德生那不同寻常的语气中，我预感到发生了大事情。

凌晨两点多钟，我赶到人民大会堂。当时，只有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在场。周恩来神情严峻地对我说：“林彪跑了，现在情况不明，北京军区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李德生司令员看看我，然后对我说：“你立即回军区机关，把作战、机要、通信部门和北空指挥所严格控制起来，没有总理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部队。”我站起来，对着周恩来和李德生说：“坚决服从总理的命令。”便转身离开，赶紧驱车急驰军区机关。

赶到军区机关时，天还没亮。我让作战值班室立即通知军区领导，马上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会上，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和李德生司令员的意见，与会人员都表示，在关键时刻，坚决听从党的指挥。一连几天，我和其他军区领导都住在办公室，坚守岗位，按照分工抓好自己分管的战备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没有出任何问题。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北京军区按照中央部署逐级向部队作了传达。不久，正在进行的“批陈整风”运动变为“批林整风”运动。运动中，不断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批示，中央陆续批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广大指战员对林彪事件的发生感到极大震惊，对林彪一伙制定《571工程纪要》策划谋害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表示了极大义愤，对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示坚决拥护。后来，中央又陆续批发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之二）和《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等三个材料。军区组织干部战士阅读这些材料，联系部队实际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肃清林彪在部队的影响。结合批林，还组织部队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六本书，学习毛主席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和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通过学习，提高干部战士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批林整风”运动，比较系统地批判了林彪的罪行，使部队认清了林彪一伙的真实面目，提高了对极“左”倾向危害性的认识，给“左”的狂热思潮降温，促进人们冷静思考，对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和军事训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这场运动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左”的，又有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问题也不少。

回顾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运动，我认为，总的说来是稳妥的，但发生过几个问题。一是前文说到的又一次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这次把“华北山头主义”与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了。毛泽东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写到：庐山会议上华北组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按全会简报编为第六号）“是一个反革命简报”。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大将。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中央批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一）中也说，经过华北会议，改组北京军区，“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脚。”这一《谈话纪要》和“材料”，把北京军区的问题说得很严重，纲上得也很高，运动中批判的规模、声势就更大了。就是在这一次，说郑维山是这个“山头主义窝子里的窝主”，我是“副窝主”的。二是批判“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战士运动”。毛泽东在《谈话纪要》中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个一好也许带得好，也许带得不好。”毛泽东在10月4日接见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毛泽东指出“四好连队”运动中的形式主义，“现在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是正确的。但是，部队在贯彻毛泽东这一指示中，批判“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战士”，曾一度引起思想混乱。“四好”、“五好”内容没有错，是搞了多年的、千百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许多人在这个运动中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喜报送回家乡，事迹记入档案，终止“四好连队运动”和“五好战士运动”是可以的，批判则是不妥当的。军区发现问题后，及时作了纠正。三是对某军政委和山西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1972年12月，北京军区党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讨论深入“批林整风”问题，会上对这两位同志进行了批判。某军政委与林彪在历史上没有瓜葛，在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时，他说“不能以人废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八作风’，还是对的”。这个话没有错误，却被以“为林彪鸣冤叫屈”而受到批判和免职审查处理。那位副司令员分管山西省国防工办工作，参加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和国防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根据周恩来谈的纠“左”精神，要求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他主持召开的山西省国防工业会议，就是贯彻国防会议精神，并写了会议纪要，列举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十种表现，要求把“批林整风、开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群众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当时，周恩来在各个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恐慌和不满，形成了批极“左”与反批极“左”的尖锐斗争。新华社记者把山西省国防工办的做法写了一期内参清样，发到中央各领导人，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这样，这位副司令员便在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左”还是极右的尖锐斗争形势的背景下，受到了严厉的错误批判。

北京军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还按照上级要求，认真清查了与林彪集团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我与郑维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有过一些接触，郑维山被关押起来，成了揭发清查工作的重点对象。对此，我心里是坦然的。在工作中我与林彪有过接触，但是，我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任何阴谋活动。在清查中，我主动地、如实地讲清了与林彪的五次接触情况。第一次是1967年5月，林彪为军区《战友报》题写了刊头，我和郑维山带着机关的两个同志去取，在林彪那里，我们说了一些感谢的话。第二次是1967年11月，我和郑维山到林彪处汇报“三支两军”工作情况。第三次是“九大”期间，林彪接见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的领导同志。第四次是1969年10月14日，“林办”通知我与郑维山到林彪家去，陪同林彪到南口一带看地形。我们到林彪处后，林彪说



有外事活动，没有去成。第五次是1970年7月，我和郑维山到林彪处汇报北线设防问题。这五次到林彪那里去，纯属工作关系，是有案可查的。我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之外，没有任何私人联系。至于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制定的《571工程纪要》中，把38军列为“借用力量”，把某坦克师一个团列为“基本力量”，这是他们的痴心妄想，我坚信他们是调不动北京军区一兵一卒的。

为了划清同林彪的界限，我向组织作了多次认真检查交代，讲清了与林彪一伙接触的所有事，并把每次与林彪接触的谈话记录全部上交中央专案组审查。但是，我的交代与检查，总是有人不满意，过不了关。最后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说：“陈先瑞我了解他，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我才得以过关。

#### ◇ 触怒江青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在林彪住处查到林彪肯定孔孟言论的一些材料，便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阅后，认为林彪的思想源于儒家，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便提出了“批林批孔”。

“四人帮”抓住毛泽东这一想法，立即组织人员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经毛泽东“同意”转发后，用中央文件形式于1974年1月18日印发全党。1月24日和25日，正值春节期间，江青突然在首都体育馆接连两次召开驻京部队和国家机关干部参加的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和迟群、谢静宜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这样“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批林整风”运动忽然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

对“批林批孔”运动，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我从“九一三”事件中汲取了教训，对江青一伙插手北京军区部队有所警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没有紧跟江青，没有吹捧她，因而触怒了江青，又一次招致挨整。

“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多次插手北京军区部队。她抓了北京卫戍区某师6连和保定某军8连，作所谓“批林批孔”的试点。她以个人名义给连队写信，送了上百种材料和书籍，如《儒法斗争史讲稿》、《孔丘和儒家的丑态》、《历代劳动人民反孔斗争资料》、《三字经》、《论语》、《弟子规》、《神童诗》、《女儿经》、《名贤集》、《四书评》等等。这些书，连队干部战士读都读不懂，联系“批林批孔”更难对上号。江青就派人去参加，组织阅读、批判，收集情况，然后直接向她报告。2月4日和6月20日，江青先后两次把连队部分干部、战士召到北京，当面听发言，汇报，作指示。她还抽调一名连队指导员和五名战士，到湖南搞了三个多月的调查；派战士到全国各地的“批林批孔”点上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未定稿），并收集了解情况。江青还到天津某军九连，直接听发言和汇报，观看军事表演，又打靶、骑马、照相，并亲自唱“样板戏”。她到保定某军八连时，还仿照毛泽东颂南京路上好八连诗的韵律，作了两首歪诗送给部队。胡诌“孔孟道，流毒广，帝修反，因袭用，为了扫除害人虫，必须批林又批孔”，等等。她到部队颐指气使，胡言乱语。对此，我是很有想法的。

江青不仅自己到军区部队去，还派没有军籍的记者到军区机关搜集情况，规定记者可以参加包括军区党委常委会在内的所有会议，看军区的所有文件，还可以查阅档案材料。对这些“无冕之王”的行动，我既热情欢迎又保持一定距离。有的记者还真有些“作王”的感觉，但也有人政治上很敏感，如《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觉得势头不对，要了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皮手套，到驻内蒙古的边防团去了，再没有到军区机关。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向我说，他不参加军区无“批林批孔”内容的会，不看“批林批孔”以外的文件，也不写《内参》。我觉得，绝大多数记者政治上是清醒的，他们有他们的职责。

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江青的亲自“关怀指导”下，搞得乌烟瘴气。军区于2月、3月两次召开军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传达江青接见六连、八连的讲话。8月，召开基层“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江青让天津火车站工人代表和蓟县小靳庄贫下中农代表介绍“批林批孔”经验，让某教授作儒法斗争史报告。这次会议，开了近一个月，印发的经验、资料及书成堆，散会时有的军级单位不得不用卡车拉走。在全国“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那时叫“三箭齐发”，在北京军区却是乱箭齐发，又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问题翻腾一遍，军区机关二级部以上的一些领导同志，又受了一次批判。这回给我算了一次总账，查了我14个方面的所谓错误。

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头脑比较冷静。这一方面是“九一三”事件后，有所醒悟，另一方面是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叶帅接触多了，知道了一些情况。“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叶帅就给看了毛泽东2月15日在他给毛泽东的信上的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后来，叶帅还向我说，毛泽东7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当面批评了江青，并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宗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975年，叶帅给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同志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毛主席讲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我向叶帅汇报过江青插手北京军区部队的情况。在我调成都军区工作时，叶帅同我谈话，还说我对“四人帮”的认识是比较早的，要我到成都军区后继续注视“四人帮”的活动。

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我早就有反感。我一向采取避而远之的办法，有时开会为避免见面便绕道走。江青也看出了我对她的态度，总想找机会报复一下。“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京剧团150多人下放到张家口驻军锻炼，按原定的锻炼时间和计划早已到期，可是国务院文化部不让这些人回京，说京剧团反江青，反对文艺革命，不要他们了。当时正好我到部队检查工作，京剧团就派代表找我，把剧团下放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当时北京军区正筹备演“样板戏”，需要这些演员。我回京后请示周恩来总理，提出把这个团收归北京军区，作为军区的京剧团保留下来。周总理说：“你这个意见很好，以你们军区的名义写个报告来，我批一下。”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精神，这个团很快被改为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京剧团了。为此事江青大为恼火，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我和江青在这件事上“结下了仇”，江青对我耿耿于怀，有机会就想整我。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到处说：“陈先瑞是紧跟林彪的，是郑维山的同伙。”她到天津某军活动时，向该军军长、政委说：“陈先瑞是哪路人马，何许人也？”纪登奎对我的处境感到忧虑和不安，他曾以关心的口气劝说：“你抽时间到6连、8连去看看，那是江青抓的点，看有什么经验，帮助总结一下。”我说：“正因为是她的试点，我才不去，别去了说错话。刚刚反过陈伯达是华北的太上皇，她现在的做法与陈伯达有什么两样！”没过多久，江青在京西宾馆开会，让她抓的试点单位介绍“批林批孔”经验。纪登奎又对我说：“你去听听会，了解下情况，对开展军区的运动有好处。”我说：“她开这类会我不去，如果是军委或总部开会我去。”我没有去参加这次会议，陪陈锡联到北京军区北线看地形去了。

京西宾馆会议后，北京军区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江青在京西宾馆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将要结束时，我回到北京。当晚，纪登奎就给我打电话，说明天军区会议结束，你做个总结讲话。我对军区召开这次会议情况很不了解，一再推说不能讲，可纪登奎却一再说让我讲讲后会议就结束。就这样，我根据自己对“批林批孔”的理解，讲得很随便。我说：“对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还不够理解，现在要一面学习一面搞运动，在精神上需准备挨点批，挨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想到，我的讲话内容很快就被河北省军区的人告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按捺不住对我的怒火，于5月12日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纪登奎、陈锡联写信，说“陈

先瑞不带头批林批孔，不作自我批评，把矛头指向群众，借批林批孔发牢骚，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得不力”等等，弄得北京军区领导很紧张。

在江青写信的当天晚上，军区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陈锡联、纪登奎传达江青的信，对我进行批评。我于5月13日向江青写了检讨，经陈锡联、纪登奎转给江青。我在检讨中说，江青“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我的错误的严重性，这是对我的关怀和挽救，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时，对我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有重要意义”。其实，这个违心的检讨，是陈锡联、纪登奎同志为保护我过关，亲自帮助写的。在那种高压下，不得不低头。

写了检讨也没有解江青的恨。不久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说：“陈先瑞不批林批孔，历史上也有问题，要审查。”周恩来打断了江青的话，说：“陈先瑞的历史是红的。在陕南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时很有影响，是我派人与他联系的，以后一直在延安。解放战争初期，毛主席把他派了出去。让他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时，毛泽东还问过他的情况，说陈先瑞大闹过华山，国民党赏几万大洋要他的人头呢。”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才使江青的阴谋一直没能得逞。也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能在军区领导岗位上工作。（本文由江为民整理）

□ 《百年潮》2000年5期

~~~~~  
【知情者说】

《解放军报》与“活学活用”运动

· 卢 弘 ·

上个世纪60年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对全党全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混乱和破坏，严重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这一“运动”之所以搞起来又祸及全国，当时的《解放军报》起了独特的重大作用。军报在林彪的直接授意下，把“活学活用”运动由全军推向了全国。我作为军报当年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对于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在这里作一些忆述回顾。

◇ 报眼上的“毛主席语录”

党内军内国内以至国外，自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其实早已大有人在。不过这与林彪的“活学活用”运动无关。林彪搞这一套其实是别有用心，他之首创并鼓吹“活学活用”，主要是利用并借助群众对毛泽东著作的朴素感情与学习热情，加以渲染、煽惑和误导，使其为自己所用，早在林彪就任国防部长的第一个月，即1959年9月，他就在全军高干会议上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他又说：“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随后他又提出了一条“捷径”中的“捷径”，“我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重要最精辟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不久，林彪又指示军报：“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于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军报上就在发表各种消息、文章的同时，经常根据当时的宣传中心，在突出位置用醒目方式选登毛泽东的一段或几句话，作为某项工作和这期版面点题似的方针指示。最初这种“语录”散见在各版上，

后来又逐渐转移到第一版右上角，真正“画龙点睛”地在“报眼”位置上。我们美术组专门设计了一个标有“毛主席语录”几字的专栏图案，从1961年4月起，开始间隔一天登一次，以后就每天都有了，并以此成为军报一个特有标志。到“文革”前的1965年底特别是1966年中，全国各地各种报刊，包括内部出版的专业小报，都在一版报眼或刊物首页甚至封面上，照搬军报的办法和格式，以大同小异的形式，登“毛主席语录”，这成了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上的—道极富时代特色的“独特风景”。

军报的“笔杆子”们根据林彪的历次指示，将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以林彪的口气和名义，总结、概括出一个口诀式的“学习方式”，即“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军报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很便于部队干部战士的“活学活用”，他们常把报纸上的语录剪下来并加以分类，有的还用小本子抄录下来，成为最早的手抄本“毛主席语录”。军报由于每天连续刊登语录，更是积累了大量各种内容的专题指示，便由资料组的几个同志，除把已见报的语录按专题编出来，还从毛泽东各个时期著作中，寻章摘句地选出各个方面不同内容的有关言论，辑录为一个个专题。为了配合某项中心工作，又特地选编毛泽东的有关言论，用一个整版集中发表。自1961年起，连续刊登出了《毛泽东同志论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论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论政策》、《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和《毛泽东同志论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等专题语录汇编，这使部队的领导机关、政工干部，特别是宣传部门，能够最快捷省事和简便地用毛泽东的指示来加强、提高和装点自己的讲话、报告及文稿，因而大受各方面的欢迎。于是，以单行本形式编辑的“毛主席语录”，也就应运而生。

◇ 单行本的问世

最早的单行本于1964年1月初印，这是一个16开本的“征求意见本”，书名叫做《毛主席语录200条》，作为当年全军政工会议的文件之一发给全体代表。人们看到这个最早的语录本后，一面提出了许多增补意见，一面要求迅速印发给全军。军报资料组的同志又按照各方面的意见，并从新发表和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选摘出新的内容，又由原来的30个专题，增加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妇女”（这是邓颖超建议增设的）、“学习”共33个专题，语录条数也新增了一倍以上，达到433条，书名也定为《毛主席语录》。

1964年5月，总政决定印发正式的《毛主席语录》，并由原编者以总政的名义为语录本写了一个“前言”，经审定后放在书前，其中有的就是林彪的原话，只是“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被时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认为不科学删去了，此事后来成为罗瑞卿反对林彪特别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罪状，虽然他一直是支持出版发行“语录”的。不过最初提出用编发“语录”方式，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确是林彪的首创和首倡。为此，“语录”编者建议在书前加上林彪题词手迹，内容是雷锋的几句话，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但林彪抄录时不知何故丢了最后一句，又将“听”字右边错加了一点，这个错字在初版时照样印出了，后来才做“技术处理”去掉了那一点。林彪垮台后有人揭发他的题词是“偷”自雷锋，“语录”编者说，“实事求是说，是我们请他‘偷’的。”有林彪题词和总政“前言”的“语录”本正式出版时，为了便于部队战士学习、使用和携带，总政又决定印成能装进军衣口袋的52开本，到“文革”中又将它印成了64开本和更小的字典纸精印的袖珍本，由于这些版本都包上了当时流行的红塑料皮，这就成了后来流向全世界的“小红书”。

继1964年5月《毛主席语录》第一个正式版本问世后，1965年8月又由军报大量

印刷发行了新的版本。这是按照林彪指示和部队的“强烈要求”做的，由原来的部队干部每人一册，战士每班一册，扩大为全军人手一册，其发行总数达到了500万册以上。编者又以总政名义改写了“前言”，其中说：“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要像发武器一样把《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发给全军每个战士。希望全体同志认真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为加速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 从军内走向军外

《毛主席语录》在军队中的大量发行，尤其是这种“走捷径”的“活学活用”方法，很快引起各界各方面的注意。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都到部队来要或买，需求量越来越大，由几本、几十本、几百本急剧增至上千本，军报的发行科立刻成为极其繁忙的“语录”专卖店。我们美术组办公室就在发行科隔壁，只见他们那里每天来人不断，热闹非凡。来要或买“语录”本的人，除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各机关以及外地各单位，还有来自各位中央领导人那儿的干部，连朱德、周恩来、彭真等都亲自派人来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处连续三次来人要，连毛泽东身边的人都来了，连要带买，从几本几十本到上百本。有的中央部委和省市索性提出要求，由他们自己翻印再版，以满足各自的大量需求。军报请示总政后没有同意，仍由军报印刷厂重版加印，印数一下达到1200余万册。后来军外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军报印刷厂实在承担不了这么繁重的印制任务，只得同意为有的大部省市提供纸型，由他们代印发行。仅公安部一家一次就印了50万册，中宣部、国家体委和安徽等省市都获得了代印权，到“文革”中，在全国各地的代印点曾多达300处左右。当时我国的各级干部，都为自己能拥有一本部队出的“语录”本为荣，部队特别是军报要同地方上打交道，就赠送几本或一批“语录”本，这成了最受欢迎的高档礼品。80年代我为老革命家伍修权整理回忆录时，他也向我说了自己作为中联部副部长，1965年带队在安徽搞“四清”时，也通过关系向南京军区要了一些“语录”本，发给“四清”工作队员，连自己作报告、写总结时，也常从“语录”本中选择几段，以示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积极贯彻与忠实执行。

“活学活用”运动从军内走向军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有资料表明，毛泽东很赞赏用语录形式来推广普及他的言论思想，曾指示陈伯达另编一本适应全党全国的内容更丰富的“语录”。陈伯达受命编出了一种3万余字的“全国通用”版“语录”。在此前后，中宣部、人民日报和中央几个大部委，也编出了内容各有侧重的不同的《毛主席语录》。但由于军报编发的“语录”本已经广为流传，不仅发行量巨大，其政治影响也很大，更因其发行在先，无形中成为全国唯一“正宗”版本，因此包括陈伯达编的那本在内的各种本子，都没能拿出来，只在内部少量印发过。这种由读“语录”带动的学习毛主席思想的运动，深得毛泽东本人的满意。他在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之后，又加了一句“全国学习解放军”。学解放军首先就是学他们的“活学活用”，这使得首倡“活学活用”的林彪，在全党全国的政治影响、作用和地位，不断提高、扩大和突出，以致在毛泽东的眼里，他已上升并超过了所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林彪的“活学活用”运动主要是通过《解放军报》鼓吹的，流行全国的《毛主席语录》更是军报首家搞出来的，这使军报也随着林彪的“价码升值”，在全国新闻界以至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急速上升。到“文革”前夕，军报的名声及其权威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军报编发的“小红书”也在各机关院校和工矿企业、文卫事业等单位，逐步达到人手一册，人人都以学习、诵读和摘引“语录”来表示自己对毛主席及其思想的崇敬忠诚。这种“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热潮，又由国内涌向境外和海外。先是香港、澳门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受了大陆的影响，通过广州新华书店以及“广交会”要求将《毛主席语录》出口，中央有关方面得到报告，会同总政实际是军报主持此事者，将“语录”上原有的“内部读物”几字去掉，改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公开出版，由各新华书店和国际书店正式对外发行，接着又翻译成几十种外文出版，发往世界各国。日文本在“语录”本还是“内部读物”时，就已在1966年4个多月内发行了30万册。“语录”本以50多种文字印出了5000多种外文版本，致使“语录”又逐步泛滥

至全球各地，其发行总数据估算达到了50余亿册。当时世界人口还不到40亿，平均全球每人都可拥有一册以上，成为20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

1966年12月16日又以林彪名义发表了《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一开头就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前言”的发表和《毛主席语录》的扩大发行，不仅把林彪首倡的“活学活用”运动推向更高潮，也把林彪本人推为除毛泽东一人以外的又一个“神”，并藉此成了毛泽东的唯一“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成了由他“亲自领导”全党全军全国的唯一“副统帅”。“文革”以后，有人把林彪的这一“再版前言”，说成出自“四人帮”之一、曾任总政主任的张春桥之手。其实“再版前言”发表时，张春桥不仅还没有到总政，在党内国内尤其在军内也没有多高地位和多大影响，真正的执笔者是军报内的“笔杆子”，最初的起草者也就是“语录”的最早编发者，他们遵照林彪的要求，将他的一套又以他的名义，向全国全球广为“兜售贩卖”出去的。

◇ “活学活用”的军内典型

军报在推销林彪“活学活用”的货色时，除了不断刊登和编发《毛主席语录》、关于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辅导”材料及“讲用报告”等等外，还大力制造和突出宣扬了一批“活学活用”的代表人物、单位等“先进典型”。人物中影响最大的是“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三人，其中主要是廖初江，他是全军以至全国第一号“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或“学毛著标兵”。廖初江是1956年入伍的一个连队副指导员，据说他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毛著，学习毛著想问题，碰上问题想毛著”，对“毛著”中的“根本观点、重要文章反复学，集中语录学观点”等等，正好符合林彪倡导的“带着问题学”和学“语录”等妙法，就被军报发现并吹捧出来。对廖初江的第一个宣传高潮是1964年3月，军报在5日的报纸上，从一版头条到二版上半版，发表了“本报记者”采写的关于廖初江事迹的长篇通讯《红旗下成长》，同时配以社论，说他的做法不仅是军队，也是全国“年青一代成长的根本道路”。随后连续发表关于廖初江的学习经验、成果和他来京被首长接见、到中央党校作报告等活动以及各部队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的报道和文章。两个来月后军报又掀起第二个学廖高潮，先是在一版头条用通栏大标题公布总政治部指示，要求响应林彪号召，在全军推广廖的经验与方法，接着从一版到二版发表了号召学习“毛著”和廖初江，“掀起新高潮”的社论。第二天又以从一版起近三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廖以《为革命而学》为题的讲用报告，随后又连续几天，每天一两个整版地发表廖的“学习笔记”和关于学廖的文章报道。到当年11月又搞起学廖的第三个宣传高潮，每天以两三个版篇幅，报道和介绍在京举行的关于“廖丰黄”的大型展览，廖本人的照片、文章和“笔记”手迹连续见报。后来的报道说，廖初江到全国各地向军内外作了多场讲用报告，共有70余万人参观了关于他的展览，这使他的名字在全国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全军以至全国头号“活学活用”先进单位，是驻长春某军某团的“红九连”，这是林彪亲自发现和树立的一个“突出典型”。1961年他到“红九连”所在的军作“调查研究”，从部队干部的汇报中听说九连90%以上的干部战士，都自备并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叫“毛主席著作是个宝，天天学习少不了”，“毛主席著作是盏灯，照到哪儿哪儿明”。林彪听罢大喜：“好的连队就是个学校，红九连就是一座好学校。”于是，军报上三天两头就有写红九连的或红九连写的报道和文章，有时一个月内在军报的一版头条上两三次，加上中央和军内以及地方各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红九连的消息。1964年国防部授予该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称号，使红九连正式成为全军全国的一大“模范”。此后，国内外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和活动，都要有红九连的反应和“表态”，他们的经验体会和事迹等等，更是到处宣扬。连他们搞卫生和参加体育比赛，都成了重要新闻，什么成绩都被说成是“活学活用的伟大成果”。

60年代军报有关红九连和“廖丰黄”特别是廖初江的报道和文章等等，实际都是军报的和他们所在部队的“笔杆子”捉刀代笔的。自红九连和廖初江等被林彪封为“活学活用”的“模范”、“标兵”后，军报的记者、编辑等“笔杆子”，不断来到和长期住在他们部队，随时发现发掘、搜集整理和总结提高他们那里的“新生事物”、“新鲜经验”等等。有的原本是很简单的事，经过“秀才”们妙笔生花的渲染发挥特别是加工拔高，马上成为重大创造和最新成果，经军报宣扬后立即在全军全国予以推广。据军报一个老编辑说由他采写、代写和编发的关于红九连的见报稿件，仅剪报就积累了满满一个巨册厚本。其实红九连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连队，连里的干部战士以及首位“学毛著标兵”廖初江等等，都是普通的年轻人，然而在他们头上套了令人目炫的光环后，搞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缘由只有禀承林彪旨意，适应他的需要而制造、树立和宣扬这些“先进典型”的军报最清楚，正是军报为林彪的“活学活用”运动树起了“样板”，捧出了一批“模范”和“标兵”，使他们一一成为政治工具式的“带头羊”。

我作为军报的编辑人员之一，也为此出了不少力。我在这一时期所创作和编发的美术稿件，主要也都是鼓吹宣扬“活学活用”的。就在“文革”风暴前夕的1966年初春，我踏着尚未化尽的残雪来到红九连所在部队，虽然因为去红九连的人太多，我没挤进去凑热闹，但却组织和指导那里的部队业余美术作者，集体创作了一批表现部队“活学活用”运动的组画。我不失军报独创特色地要求每幅画面上都要有一条切合所画内容的“毛主席语录”，带回军报后深得领导赞赏，曾以“万物生长靠太阳”为题，出了整整一版画页。在此前后我看到红九连所在部队，有一套“拼刺刀打败原子弹”的幻灯片。由于这是宣扬林彪“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思想的，我让他们复制出来，也作为一个专题画页在军报上发表了。这使军报在以美术形式宣传“活学活用”运动上，也做得有声有色，引人注目，全国美协的《美术》月刊还派人来访问我们，要求介绍组织这种创作的经验。我当时也很得意，自以为也对“活学活用”运动做了贡献。只是我的这一“功绩”，并没有保住我在“文革”中不挨斗受整。

□ 《百年潮》2003年8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